



元代基督教研究

A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Yuan Dynasty

唐晓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元代基督教研究

A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Yuan Dynasty

唐晓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基督教研究/唐晓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097-7486-1

I. ①元… II. ①唐… III. ①基督教史—中国—元代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567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元代基督教研究

著 者 / 唐晓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范 迎

责任编辑 /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486-1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国内外学界的元代基督教研究	6
第一节 国外关于元代基督教的文献及研究	7
第二节 国内学界对于元代基督教的研究	19
第二章 基督教之“也里可温”名称解析	30
第一节 “也里可温”名称的各方观点	30
第二节 “也里可温”名称解析	35
第三章 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	40
第一节 蒙古地区各部落之也里可温	46
第二节 蒙元时期基督教的其他构成	56
第三节 到底有无汉族的基督教徒	65
第四章 元代基督徒的分布	75
第一节 概述	75
第二节 分布情况	76
第五章 蒙元时期基督教人物考	85
第一节 蒙元时期的也里可温人物	85
第二节 把·扫马和马可	98
第三节 传教士、使者等	106

第六章 元朝与罗马教廷的往来	118
第一节 教廷第一位出使蒙古的使者——柏朗嘉宾	118
第二节 罗马教廷与蒙古间的其他使节	124
第三节 波罗兄弟在教廷和忽必烈之间的往来	129
第四节 罗马教廷与元朝的其他来往	132
第七章 元朝藩属国的基督教信仰	143
第一节 概述	143
第二节 元朝藩属国的基督教信仰情况	144
第八章 元代的政教关系	154
第一节 元代政教关系的主要表现	154
第二节 元代宗教政策的成因	171
第三节 基督教与蒙元统治	178
第九章 元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183
第一节 元代的宗教	183
第二节 元代宗教相容的表现	192
第三节 元代宗教间的冲突	195
第十章 元代基督教的衰亡	205
第一节 国内学者有关元代基督教衰亡的原因分析	205
第二节 其他原因	210
第十一章 元时中国的基督教十字寺及教堂	215
第一节 关于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	215
第二节 其他地区的十字寺及教堂	235
第十二章 基督教石刻及其他遗存	247
第一节 基督教石刻	247
第二节 其他基督教遗存	264

附录 古籍文献中关于元也里可温的资料	278
参考文献	302
本书索引	315

引言

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①，尊汗号“成吉思”，此为蒙古帝国之肇端；之后经过从成吉思汗到其孙孛儿只斤·蒙哥（1209~1259）近半个世纪的对外征服与扩张，蒙古民族最终由一个孱弱部落^②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汗国。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之弟忽必烈继大汗位于开平^③，“稽列圣之洪规”的同时，“祖述变通”，推行汉法，建元“中统”，并于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诏曰：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④

国号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曾经叱咤欧亚的游牧帝国转变为立足中原、采用汉制的传统封建王朝，它拥有“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

① 有些研究者认为成吉思汗创立的帝国在汉文文献中，亦被称为“大朝”，但这点在学界尚存争议。

② 据说成吉思汗诞生2000年前，蒙古人为鞑靼地域其他民族所破，仅遗男女各2人，逃到一山谷中，四面皆山，山名额儿格涅坤（Erguénécoun）。避难2人的后裔称帖古思（Tégouz）与乞颜（Kiyán）。他们的后人繁盛，分为若干部落，这些部落便是蒙古族的起源。“蒙古”这一名字，便有简朴而孱弱的意思。《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第34页。

③ 开平城亦被称为上都、上京、滦京，为元朝的夏都，1256~1260年为忽必烈所建，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正蓝旗政府所在地东北约20公里处。2012年6月29日，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讨论并通过将中国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④ 宋濂等撰《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至元八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76，第138页。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诏令卷之一，典章一，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第8页。

辽左，南越海表”^①之辽阔疆域，涵纳着丰富多元、通合共融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形态。这一王朝虽受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级划分之诟病，但种族间的迁徙、通商、杂居、通婚等客观因素在事实上增强了境内各族群间经济、文化乃至人种层面的融合。基督教在元代的存在与流布，便是随着其疆域之扩充、民族之共融、文化之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者的宗教宽容立场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对此，中国教会史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曾评论道：蒙古人的征服活动有利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首先，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和中西亚之间开辟了相对安全的通道，有利于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的接触。再者，蒙古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汗及他的属下通常对于所有的信仰均持宽容的态度，他们甚至还资助穆斯林、佛教徒及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他们看来有利于他们统治的神都值得推崇，反之这种宗教则不合时宜。^②

元朝的基督教包括也里可温^③、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会、雅各派等；关于蒙元基督教的多样性，很多文献都有提及，在蒙古大将宴支吉带至法国国王和罗马教廷的信中，便曾提道：“普天下之王在他的信中主张，在上苍的法律中拉丁派、希腊派、亚美尼亚派、聂斯脱里派、雅各派以及所有向十字架祈祷的人之间不存在差别。他们在我们这里协和一致。我们希望大王不要把他们分开，而要对所有基督教徒普施慈悲”^④。在《马可波罗行纪》（又名《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多次提及聂斯脱里派、雅各派以及罗马天主教会信徒。

其中也里可温无疑是元代基督教的主体。相关讨论可参阅本书第三章

① 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第1345页，载有：“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②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p. 61-62.

③ 笼统来讲，可将也里可温视为蒙元统治者对于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教徒称谓的汉译，相关论证参阅本书第三章“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的开始部分；也有学者（比如朱谦之）将元代也里可温称为景教，笔者在元代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种称谓的证据，故不采用此说。

④ [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4，第174页。

“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也里可温在元代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不但表现在众多也里可温跻身统治集团这一事实，同时也表现在其人数及教区的分布上。在蒙古高原各部落统一过程中，成吉思汗家族不断与信仰基督教的部落通婚，并重用各民族、各国家中的贤德人士，这些举措自然让蒙古帝国建立之初的统治集团内部拥有数量庞大的也里可温信徒。比如，成吉思汗及继其位的窝阔台汗均重用克烈部也里可温镇海（*öinqai*），其位如帝国丞相，凡是皇帝圣旨，未经镇海用回纥文副署，不能发布在北方中国^①；窝阔台的妻子脱那列哥（*Turakina*）也为乃蛮部之也里可温。^②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亦是克烈部的也里可温，她是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旭烈兀汗和阿里不哥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妻子托古斯可敦也是来自克烈部的也里可温；蒙哥的重要近臣博刺海（*Bolghai*）亦是一位来自克烈部的聂斯脱里派信徒，1255年和1256年，蒙哥汗召集僧道在和林辩论时，在场证义的就有博刺海。^③元时忽必烈的外孙高唐王阔里吉思作为汪古部的首领，起初虽是也里可温，但他后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忽必烈身边的重臣爱薛据考证是来自西域弗林的也里可温。^④

公元9世纪末，也里可温仅有活动于西亚和中亚的13个教区，最东部的教区设在撒马儿罕。^⑤而在元朝时其已发展到25个，其中有4个在中国境内，第11教区为秦尼（*Sinae*，即中国）、第19教区为可失哈耳（*Cashgar*，今新疆喀什）、第23教区在汗八里（*Khanbaleg*，今北京）、第24教区为唐兀（*Tanchet*=*Tangut*，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部

① 按伯希和的考证，镇海曾于1222~1224年间陪同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从中国东部到阿母河。成吉思汗问道于丘处机时，镇海就在成吉思汗旁边，镇海后人多官仕于蒙元一代，他的三个儿子都拥有基督徒的名字，分别是要术木（*Joseph*）、勃古思（*Bacchus*）和阔里吉斯（*Georges*）。〔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第54页。

② 此点尚存争议，也有史家认为她来自蔑儿乞部，乃蛮部虽非全民信仰基督教，但其信徒却占有一定比例，而蔑儿乞部则只有少量基督徒。脱那列哥曾善意接待过来自教宗因诺曾爵四世派来的使者。〔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第203页。

③ 〔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第55页。

④ 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86.

⑤ 撒马儿罕（*Samarqand*），意为“肥沃的土地”，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中亚历史名城。在公元9世纪后期，撒马儿罕的权力已完成从阿拉伯征服者向本地伊朗人，即历史上古粟特人后裔过渡，这个纯伊朗人的萨曼王朝从公元875年到公元999年间以布哈拉为首都，成为河中地区的主人。

分地区),当时的中国无疑成为该教派最重要的传教区域之一。^① 考古发现元代也里可温的遗迹几乎遍布于全国各地,据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介绍,元时中国境内建有也里可温十字寺的城市有:(1)可失哈尔;(2)撒马尔干;(3)也里虔;(4)唐古;(5)和阗;(6)吐鲁番;(7)哈密;(8)俭州;(9)阿力麻里;(10)伊犁;(11)轮台;(12)沙州;(13)甘州;(14)肃州;(15)兰州;(16)临洮;(17)凉州;(18)鄂尔多斯(东胜、石柱子梁);(19)天德;(20)净州;(21)归化城;(22)和林;(23)宁夏;(24)灵州;(25)太原;(26)大同;(27)北平;(28)房山;(29)涿州;(30)长芦镇;(31)河间;(32)大名;(33)东平;(34)济南;(35)临清;(36)益都;(37)扬州;(38)徐州;(39)镇江;(40)洛阳;(41)杭州;(42)温州;(43)长安;(44)盩厔;(45)泉州;(46)福州;(47)广州;(48)重庆;(49)成都(送仙桥侧);(50)昆明;(51)鞍山。^②

而信徒更是星罗棋布,仅以镇江地区为例,按照元代官方的统计数字,镇江来自外地的“侨寓”人有3845户,其中包括蒙古人29户163人;畏兀儿人14户;回回人59户;也里可温23户106人;唐兀人(河西人)3户;契丹人21户;女真人25户261人;汉人3671户。^③ 另外,在镇江的2948名“躯者”^④中,有也里可温109人。类似于镇江,在当时的大都、行在^⑤、刺桐^⑥等地均居住着大量也里可温,也里可温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在中国的户籍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当时元廷甚至设立官至二品的崇福司来专门管理也里可温事宜,元代的史事、税制、典章、文学等典籍中也多涉及也里可温群体及人物,其在元代社会中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天主教徒、正教徒以及其他东方教会信徒在上述地区亦有广泛分布。1294年,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圣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在信中说,大都(今北京)受洗礼的天主教徒不下6000人,在杭州、扬州、常熟等

①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第310~312页。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79页。

③ 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90~93页。

④ 躯者,即无家可归,寓于他人家者。

⑤ 今杭州。

⑥ 今泉州。

地均居住着罗马天主教徒，有些地区甚至还拥有主教座堂。而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及部分钦察人和斡罗思（俄罗斯）人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在元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基督教群体中，还有众多亚美尼亚派和雅各派信徒，这点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但在众多有关元代的史料文献中均有提及这些信徒，这点在本书中将有详细论述。

与基督教在元代发展的崇盛景象相比，国内学界对于元代基督教却乏有系统深入之作。随着中国当前基督教信徒人数的增多，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与震荡，让基督教研究日益步入国人视野，人们热衷于考察它的当前存在及潜在发展趋势，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而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考察却有所忽视。事实上，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较基督教哲学及现状研究更早为学界所关注，但因其乏有短期的功利价值，而使当前较少有人问津，殊不知，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存在总要有其信仰渊源及历史存在之参考，此所谓鉴古知今也。

本书将从也里可温名称考释、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元代基督教徒的分布、元代基督教人物考、元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关系、元代属国之基督教、元代政教关系、元代与罗马教廷之往来、元代基督教之衰亡、元代基督教的遗迹遗物等若干层面对这一中国古代乏人问津的群体及其信仰进行介绍、考察及评述。笔者非史学专业出身，之前亦较少涉及元代宗教研究，故作此专题实有惴惴之感，好在有前人之研究为基础，加之多年不断之阅读及积累，这本书权当是有关元代基督教研究的综述，只为详尽介绍而已。

第一章 国内外学界的元代 基督教研究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即唐朝景教、元代基督教、明清之际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 1807 年马礼逊带来的近代基督新教的传播。但综观国内学者对此四个阶段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唐代景教、明清天主教及近代基督新教的研究早已开始，并形成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史论及专著，但对于元代的基督教却较少有学者涉及，既有的研究多以专题论文为主，专著并不多见，除陈垣先生 1917 年完成的《元也里可温考》这部开山之作外，对于此主题的系统研究少之又少，直到 2012 年“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中收录了殷小平女士的《元代也里可温考述》这部专著，才略补此遗憾。

相对来说，西方学者对于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早于国内，凭借国外丰富的档案文献数据，加之研究者自身的语言史地知识之禀赋，他们在一些专题及与此相关的背景资料的译注和研究方面尤显细致深入，并为国内元代基督教研究提供了众多基础素材。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的兴趣所在并不在元代的基督教，他们多为研究者在进行蒙古史、东方史、西域史，甚至是对旅行家们的行记进行转译、注释过程中，顺便做出的末节枝杈研究，系统之作亦不多见，华裔学者唐莉（Tang, Li）在 2011 年完成的《蒙元时期的东叙利亚基督教》（*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①）可谓其中的罕见之作。

本章将对海外及国内的元代基督教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这些研究观点多在书中后续章节中有所体现，在综述过程中，多只是提及研究题目及其中创见之处，仅作概观之用。

① Tang, Li,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 (12th-14th centuries)*,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

第一节 国外关于元代基督教的文献及研究

对于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最早是由西方学界开始的。在 17~20 世纪这几百年间,西方著作中涉及元代基督教的内容虽呈零星、散见之态,但在数量上颇为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元朝期间在华旅行的西方人士的游记和见闻的译介与研究;二是关于蒙古皇帝与欧洲统治者及教廷之间往来的研究;三是对基督教在中国元代时期发展的研究;四是在撰写蒙古史、西域史和叙利亚东方教会史过程中对此主题的关涉。

第一类关于元代基督教知识的介绍主要集中于 17~19 世纪,此时正值欧洲东方学^①初兴与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诸如柏朗嘉宾(Jean Du Plan Carpin)、鲁布鲁克(Willem van Ruysbroeck)、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Friar Odoric)、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等人的行记得以用各种语言加以翻译、注释和出版,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早在 16 世纪末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 Hakluyt, 1583-1616)撰写的《英语民族主要海陆旅行与发现》中,就包含有上述行记中的内容。1865 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依据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的原本的抄本整理的行记刊行,其中增加了许多史地及汉文史籍中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版本学及史地研究,特别是基督教史研究上的意义。此外,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的《马可波罗书》(1871 年初版)因其注释详尽、考证精当而成为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之后较完善的马可·波罗注释本还有伯希和(Paul Pelliot)和东方学家穆尔(A. C. Moule)合作完成的拉丁文合校本以及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一意混合语原文抄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包括马可·波罗在内,当时这些旅行家多以传教士、基督徒的身份来到蒙元帝

① 东方学产生并孕育于 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的西方,在 19 世纪得以确立。它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尤其是北非)地区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最初由到东方传教、贸易和探险的人员所记载东方各国相关情况而被关注。16 世纪末的巴黎大学和 17 世纪的牛津大学都开设有近东语言课程,在这一阶段语言学研究的的基础上,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的解读,是东方学确立的基础之一,其标志是各国东方学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召开。1873 年,世界东方学家代表在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20 世纪以来,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的研究队伍,1993 年,第 34 届东方学国际会议在中国香港举行。

国, 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对蒙元帝国中的基督徒群体给予格外的关注。在这些行记中, 不但介绍了各地教堂与信徒的分布情况, 还向人们呈现了蒙古皇帝对于基督教及其信徒所持的立场、态度和言行, 还原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在蒙元时期的微妙关系, 这些译介成为人们研究元代基督教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最近几十年, 在有关此类行记的研究著作中, 欧洲学者还对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东行纪》进行了重新校注出版, 其中以柔克义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H. П. 莎斯季娜 (Н. П. Шастина)、J. 贝凯 (Dom Jean Becquet)、韩百诗 (L. Hanmbis) 和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等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①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基于梵蒂冈及欧洲各国档案馆中的相关史料而对教廷及欧洲各国与蒙元帝国之间的往来进行的梳理和研究。这些论文包括德国学者梅纳特 (J. G. Meinert) 的《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0)、法国学者菲鲁萨 (M. Ferussac) 的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 1824)、雅克 (E. Jacquet) 的《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 1831)、阿贝尔·雷慕沙 (Abel Rémusat) 的《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②、法国学者伯希和 (P. Pelliot) 的著作《蒙古与教廷》(1924)^③、法国中世纪史专家让·理查德 (Jean Richard) 撰写的《教廷与波斯蒙古人的相互关系》(《亚洲杂志》, 1949)、《13、14 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 1 卷, 1956) 等。

国外学者关于元代基督教的第三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蒙元时期中

① 这些学者的作品包括柔克义的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as Narrated by Himself, 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lan de Carpine*,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ory Notice, by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H. П. 莎斯季娜的《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 A. И. 玛林娜翻译、编辑、作序、注释, 莫斯科, 1957; 贝凯和韩百诗的 *Jean de Plan Carpin, Histoire des Mongols*, Paris, 1965; 道森的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Ams Pr Inc, 1980。

② In M.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Recueil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vol. I. et II,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③ P.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23(1922-3), 3-30, 24(1924), 225-335; 28(1932), 3-84。

国境内基督教的考察上,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英国汉学家亨利·裕尔 1866 年出版的《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①、俄国史家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的代表作《中国史籍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1872)^②、英国学者穆尔(A. C. Moule)的《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及《聂斯脱里派信徒在中国:一些修正和补充》^③、法国汉学家戈迪埃(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 1927)、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撰写的《中亚及远东地区的基督徒》(1931)^④、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支那基督教的研究》和《中国的景教文献及遗迹》(1937)^⑤等。

其他相关论著还包括敏格纳的《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早期传播:一个新的文献》(1925)^⑥、司各特的《一些蒙古景教十字架》(1930)^⑦、怀特的《对于〈一些蒙古景教十字架〉一文的回应》(1930)^⑧、穆尔的《中国景教徒对于十字架的使用》(1931)^⑨、戈迪埃的《在中国和中亚蒙古人中的基督徒》^⑩、马克·布朗的《景教十字架传奇》^⑪、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的《厄尔呼特人——鄂尔多斯蒙古基督徒的

① 英文书名为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其中第三卷收录了众多蒙元时期基督教的资料。

②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 С. 36 ~ 82.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开科研究员惠赐《中国史籍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俄文复印稿,并介绍了相关内容;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王帅老师翻译了该文重要段落。

③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1930. and A. C. Moule, *Nestorian in China: Some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40.

④ P. Pelliot,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T'oung Pao* 28, pp. 623-644.

⑤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1st ed. Tokyo, 1937.

⑥ 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Bulletin of the John-Rylands-Library Manchester*, 9, 1925, pp. 297-371.

⑦ P. M. Scott, *Some Mongol Nestorian Crosse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61, pp. 104-108.

⑧ William C. White, *A Response to Some Mongol Nestorian Crosses*,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61, 1930, p. 251.

⑨ A. C. Moule, *The Use of the Cross among the Nestorians in China*, in *T'oung Pao* 28, pp. 78-86.

⑩ Cordier, H.,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sous le Mongols*, in *T'oung Pao* XVII, pp. 45-113.

⑪ Mark W. Brown, *The Romance of Nestorian Crosses*, in *Chinese Recorder* 64/2, 1933, pp. 76-82.

后裔》(1933)、曼非德的《蒙古的聂斯脱里遗迹》(1935)^①、伯纳德·海瑞的《鄂尔多斯蒙古人的景教发现和基督教在远东的古代历史》(1935)^②、欧文·拉迪穆尔的《内蒙古的一座聂斯脱里废墟》^③、《论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遗迹》^④和《再论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遗迹》^⑤、D. 马丁的《关于绥远归化景教遗址的初步报告》(1938)^⑥、阁劳恩巴特的《内蒙古境内的突厥石刻》(1939~1940)^⑦、吉恩·道韦勒的《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叙利亚教会的扩张》^⑧、韩百诗的《14世纪鞑靼之中的两个基督教名字》(1953)、于克的《基督教在中国：从鞑靼到西藏》^⑨、福斯特的《泉州城墙上的十字架》^⑩、江上波夫的《汪古部的景教系统及其墓石》^⑪和《鄂伦苏木与孟帖科维诺罗马基督教堂的发现》(1962)、中见立夫的《内蒙古鄂伦苏木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⑫、村山七郎的《内蒙古百灵庙和泉州地区的叙利亚文景教碑刻》(1963)^⑬、B. 巴托尔德的《关于成吉思汗王朝信奉基督教的问题》(1964)、K. 榎木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聂斯脱里基督教——根据近期的历史及考古发现进行的考察》(1964)^⑭、莱哲蒂的

① Bökenkamp, Manfred, *Nestorianische Ruinen in der Mongolei*, in: *Atlantis* 9, 1937, pp. 53-55.

② Bernard Henri, *La Découverte de Nestoriens Mongols aux Ordos et l'Histoire ancienne du Christianisme en Extrême-Orient*. Tientsin: Hautes Études, 1935.

③ Owen Lattimore, "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XXXIV, No. 6 (December), pp. 481-497.

④ 《东方学报》第9册，东京，1939，第1~41页。

⑤ 《东方学报》第11册，东京，1941，第160~175页。

⑥ D. Mart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s north of Kueihua, Suiyuan, *Monumenta Serica* 3, pp. 232-249.

⑦ Groenbech, K., Turkish Inscriptions from Inner Mongolia, *Monumenta Serica* 4., pp. 305-308.

⑧ J. Dauvillier, L'Expansion de l'Église Syrienn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XI, pp. 62-87.

⑨ M. Huc,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n Tartarie et au Thibet*, Paris: Gaume Frères, Libraires-éditeurs, 1957.

⑩ John Foster, Crosses from the walls of Zaitun, *JRAS*, Parts 182, pp. 1-25, pl. I-XVII.

⑪ 《东方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二卷，昭和二十六年。

⑫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436~448页。

⑬ MURAYAMA Shichirō, Die 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Pailing Miao und Ch'üan-chou, *Trans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No. VIII, 1963, pp. 22-25.

⑭ K. Enoki,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edieval Time according to Rece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Problemi Attuali di Scienza e di Cultura. Atti dei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 L'Oriente Crstiano nella storia della civiltà*,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964, nr. 62. Rome, 1964, pp. 5-81.